

【法国文学】

萨特的报刊媒体实践与文学风格的嬗变

阎 伟

【摘 要】1945年以后,萨特为践行“实践文学”的主张,高度介入媒体,从而形成“媒体实践文学”。其中在报刊媒体的实践活动极大地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通过采取比较研究方法,对比分析同时期萨特的新闻文本与文学文本,可以发现萨特的报刊媒体实践活动拓展了其文学创作题材,强化了新的文体意识,激进的新闻立场催生了语言暴力修辞,最终导致其文学风格的嬗变。萨特的“媒体实践文学”从理论到实践都存在瑕疵,但从实际效果来看它实现了其介入社会、改变世界的初衷。

【关键词】媒体实践文学;文学风格;“正面”特点;“背面”特点

【作者简介】阎伟,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新闻与文化传播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比较诗学、国际传播与萨特研究。

【原文出处】《外国文学研究》(武汉),2021.4.87~9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萨特的大众传播思想和媒体实践文学研究”(15BWW004);“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重点A类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阈下中国国家形象在西方主流媒体的百年传播研究”(2722020PY009)。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萨特介入社会的程度加深,其文学实践与大众媒体的关联也日益密切。而以媒介为分类标准,最早对萨特的著述予以梳理归纳的法国学者米歇尔·贡塔(Michel Contat)和米歇尔·瑞巴卡(Michel Rybalka),编撰了一套《萨特文集》(*Les Ecrits de Sartre*)。该书是较早关于萨特媒体研究的成果。此后,类似的研究成果明显增多。在报刊媒体方面,代表性著述有安娜·博歇蒂(A. Boschetti)的《知识分子的事业——萨特和〈现代〉杂志》(*Sartre et Les Temps Modernes*)一书。该书从《现代》在法国期刊领域的地位、组成结构、办刊原则、编辑策略与刊物风格等方面,探析它在确立和维护萨特的文化霸权方面所扮演的角色。霍华德·戴维斯(Howard Davies)的《萨特和〈现代〉杂志》(*Sartre and “Les Temps Modernes”*)一书,从政治学和文学的双重视角研究了《现代》创刊以来的风格变化。20世纪九十年代,英国学者迈克尔·斯克瑞恩(Michael Scriven)。专注于研究萨特的媒体实践,发表多篇论文,并出版了《萨特与媒体》(*Sartre and the Media*)一书。该书资料翔实,立论扎实,在学界影响较大。可见,西方学界

很早就注意到萨特的文学实践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并从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和传播学的角度予以研究,成果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研究重点多聚焦在媒介对文化、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上,在萨特文学风格转变与大众传播媒介的关系方面,尚有广阔的研究空间。

法国哲学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最早评论了萨特文学风格转型问题。1948年,他发表《写作的零度》一文,对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的观点提出质疑。他反对萨特的文学应干预社会、生活和政治等主张。1959年,他又在《文艺批评文集》中,通过区分“作家”(écrivain)与“写家”(écrivain),再次强调作家的写作应避开现实,朝向语言和形式、朝向写作行为本身,而写家往往屈从于文学之外的要求。巴尔特认为萨特亲历了法国文论从二战以前到战后的转变,成为一个独特的过渡人物,他的文学作品具有“过渡的”(transitional)或“分裂的”(divided)的“特殊价值”,而成为那个时代的典范。1961年,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完成并出版了博士论文《萨特:一种风格的起源》(*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在他看来,风格不仅是一种审美意蕴的外化,而且显示出作品价值的历史意义。萨特的文学作品,作为一种源起的风格形式,代表了一种新写作模式与旧文学形式的根本决裂。由于萨特的媒体实践尚在进行之中,詹姆逊并没有特别深入探讨新兴大众媒体与其文学风格之间的关联。法国学者如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和让·弗朗索瓦·西里奈利(Jean-Francois Sirinelli)等人,也较早感受到萨特的媒体实践对其文学风格的重要影响,他们在回忆录中都有描述。但只是作为资料式的展示,并未成为问题域深入研究。另外,法国媒介史学家雷吉斯·德布雷(Regis Debray)以媒介域为视角,探讨了以萨特为代表的当代法国知识分子生存的媒体环境与思想发展。美国思想史学家托尼·朱特(Tony Judt)在其一系列战后欧洲政治史、思想史的著述中,都有对法国知识分子尤其是萨特的精彩论述,特别是他们与大众文化及媒体关系的描述,新见颇多。以上论著既是后续研究赖以展开的知识背景,也为萨特的媒体研究指明了方向。

一、萨特的“媒体实践文学”概念及后期创作

1947年,萨特在《什么是文学?》中提出了“实践文学”的概念。为说明这一概念产生的来龙去脉,在此对他同时使用的“存在文学”“处境文学”“介入文学”和“整体文学”等术语加以梳理区分。

所谓“存在文学”,是指“叙述一个稳定社会内部的个人生活中的事件”的文学,它“记录、描写、解释一个静止的世界内部某一个别系统的屈曲、分割、退化及其缓慢的解体过程”(萨特,《萨特文集》7:257)。法国17世纪古典文学就是典范,它使人们陷于沉思冥想的静止状态中而无法行动。所谓“处境文学”,是指作家被重新纳入历史时,被迫创作的一种强调历史性的文学,企图在历史事实相对性的内部重新发现形而上的绝对性(萨特,《萨特文集》7:251)。比如萨特创作的“处境小说”或“情境剧”。“介入文学”则是从哲学的角度界定文学。“介入”是指任何一种文学形式(诗歌除外)都具备的功能,它意识到文学具有形而上学的能力,强调话语的力量。萨特认为,文

学语言一经表达便“揭露”了世界,而“揭露”世界总是意味着已经“改变”了世界。

“实践文学”则是一种强调文学社会责任的政治概念,号召人们在文学的感召下直接参与社会实践活动。“整体文学”是指“只有在社会主义集体中,当文学终于明白自己的本质,完成了实践与存在的综合,否定性与建设的综合以及做、有、存在三者的综合之后,文学才配得上整体文学的名字”(萨特,《萨特文集》7:268—269)。为了实现文学创造历史的举动,必须下决心“行动”,抛弃“存在文学”的惰性,倚借“处境文学”的历史性,以介入为宗旨,开创一种“实践文学”。因此,所谓“实践文学”(法语 *littérature de la praxis*, 英语 *literature of praxis*),是指超越沉浸于沉思冥想的“存在文学”去唤醒人们行动的文学。它既是“存在文学”的反动,又是“介入文学”的现实化,同时还是“整体文学”的雏形或前奏。在完成了存在与实践、否定性与建设以及存在、有、做三者的交汇融合之后,最终走向整体文学的通途。

为实现这一目标,萨特试图在一种文学理论和现实具化的巨大差异中,找到一条可堪行动的方法。而寻找方法,就必须面对一种技术主义的挑战,即如何将文学介入落实到每一个媒介域的操作当中。通过哪些媒体和媒介化的手段,可以将传统术语如“阶级”“政治斗争”“实践”“统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的探讨,传递给全世界的无产者?萨特的回答是——所有。从哲学论文到电影剧本,他尝试了所有的传播媒介。他从不把自己的思想封闭在一部作品中,也不愿把自己的形象定格在一种媒体上。他致力于将哲学思想变为行动指南,把对世界的构想转变为政治誓言,并将这一过程积极媒介化。

以萨特之见,媒介即实践,实现文学介入的过程也意味着对中介手段——媒体的占有与征服,介入媒体就是介入社会。实践文学从目的上来看是对社会的揭露和改变,从形式和手段上来看是对媒体的介入与利用。因此,“媒体实践文学”就是“实践文学”的现实具体化,是一种通过媒体、媒介因素完成社会实践、实现政治诉求的文学。它诞生的主要标

志是萨特1945年10月创办的专业期刊《现代》(*Les Temps Modernes*)。这是“萨特介入媒体的起点,不仅是在于他依靠个人的才华,从作家转变为新闻记者,而且在于当时有足够丰富的报刊媒体资源,以供他利用印刷品形式在公共领域表达政治观点”(Scriven 20)。1940年代以来,萨特写电影剧本、办报纸、创刊物、上电视和做电台专栏节目,他高度介入媒体,并以此影响公众。他以《现代》杂志为根据地,同时将创作触角延伸到法国各大报纸,成为专栏主笔或报纸主编,发表了大量文章。这些文章与当时的社会政治状况关系密切,它们往往依托大众关注的某个媒体事件,以文学(哲学)形式迅速作出反应,在推动事件持续发酵之时,又予以反思和批判,从而达到介入社会的目的。

报刊媒体的实践活动又极大地影响了萨特的文学创作,促使其文学观念及风格的嬗变。他特别推崇即时生产与消费的新闻写作,“如果要选择最为高尚的体裁,如果非要说明哪种体裁最适合于说明文学的有效功效、即时作用、对此时此刻的依存特点,那就是报章文体”(转引自列维109)。在他看来,新闻调查和报告文学可能成为当代最重要的文学体裁之一,如《震撼世界的十天》(*Les dix jours qui renversèrent le Monde*)和《西班牙遗嘱》(*Testament Espagnol*)就是这个时代为数不多的传世之作。要创作出这样的作品,“对于记者来说,最需要的品质是能够直观地、即时地捕捉意义,并能够将其组合在一起,为读者提供易于理解的综合信息:这是我们对所有作者的要求”(Sartre, *Situations* 30)。他自己身体力行,积极尝试报刊媒体文学的创作实践。正是受到报刊媒体的影响,他后期的文学作品兼具了新闻报道的笔法和浓厚的时评风格,可称之为“报章文体”,其特点是注重新闻性、时效性和现场感。

二、萨特介入报刊媒体的文学实践活动

在二战时期,报刊仍处于法国社会的信息传送和文化交流的中心。它既是当时政治活动的一面镜子,也是政治活动的重要参与者。同时,报刊不仅有利于分化公众,而且可以更好地赢得受众。它在社

会团体的凝结过程中起直接作用,而这种团体以一种有力的离心的方式影响着社会主体和政治主体(让纳内56),大多数知识分子通过介入媒体成为了政治参与者。为了与广大的潜在读者建立更为广泛、直接的联系,萨特也积极地参与了报刊媒体实践活动。以下就从期刊与报纸两个方面分别说明。

首先是他在《现代》杂志的实践活动。它作为萨特存在主义思想宣传活动的媒体平台,不仅表明了战后法国知识分子对社会问题的共同关注,而且也充分展示了萨特“介入文学”非个人目的。他直言文学介入就是不错过他那个时代的重大社会问题,当时法国和世界的政治和社会热点事件就成为《现代》的主要内容。他和《现代》杂志一起,努力践行时代赋予的使命——承担全世界,对世界上发生的一切负责。

从1945年到1980年,萨特在《现代》杂志上共发文81次,计51篇(其中有连载作品)。其中四部戏剧,包括《脏手》《魔鬼与上帝》《涅克拉索夫》和《阿尔托纳的隐居者》;一部小说,《自由之路》的第三部《痛心疾首》;一部自传《词语》和十多篇文艺评论,几乎包含了后期所有重要的文学作品。同时,一些重要的文学理论和政治主张也是通过《现代》提出来的。

其次,萨特在报纸媒体的实践活动分为以下六个阶段。第一,1944年以后的《战斗报》(*Combat*)和《费加罗报》(*Le Figaro*)阶段:1944年8月,巴黎解放。萨特为加缪主编的《战斗报》撰写系列报道《漫步于沸腾的巴黎》,自此进入报纸媒体。1945年1月,他又以特派记者的身份前往美国考察。在半年期间,他为《战斗报》撰文20篇,《费加罗报》12篇。第二,《解放报》(*Libération*)阶段:从20世纪四十年代中后期到五十年代初期,萨特成为法国共产党的“同路人”,并与苏联保持了良好的关系。1954年,他受邀访问苏联,在《解放报》上发表了一系列访苏文章《让-保罗·萨特的苏联行记》,共计5篇。第三,《快报》(*L'Express*)阶段:在1958年和1961年之间,因为阿尔及利亚局势恶化和戴高乐重新上台,他就这些事件进行采访,并在《快报》上发表了四篇系列文章“胜利”

(“Une Victoire”),主要讨论阿尔及利亚的刑讯逼供和戴高乐政府的专制问题。第四,1960年代的《法兰西晚报》(*France-Soir*)阶段:20世纪五十年代,法国传媒大亨皮埃尔·拉扎雷夫(Pierre Lazareff)担任《法兰西晚报》的主编。这是一家大众化的报纸,发行量大,在法国颇有影响。1960年,萨特在该报发表关于古巴之行的系列文章“糖的风暴”(“Ouragon sur le sucre”),总计16篇。第五,《新观察家》(*Le Nouvel Observateur*)阶段:1964年,萨特协助创办了《新观察家》。该刊“体现了正在发生的变化所激发的热情,宣告不满现状的狂风暴雨正在形成”(里乌西里内利304),成为左派知识分子的思想阵地,也是观察萨特政治意识的风向标。共发文5篇。第六阶段:“革命出版物”(The Revolutionary Press:1970-1974);萨特与革命出版物的关系史持续于1970-1974年,其间曾担任20多个出版物的领导职务,其中主要有《人民事业报》(*La Cause du Peuple*)、《我控诉》(*J'Accuse*)、《人民事业报—我控诉》(*La Cause du Peuple-J'Accuse*)以及《解放报》(*Libération*)。他在系列“革命出版物”上发表了一百多篇文章。

总之,在报刊媒体的聚合作用下,萨特成为战后法国声名最为显赫的知识分子,统治公共舆论达30年之久。几乎所有法国人都读过他的文章、受过其思想的洗礼。这些报章文体的形式、内容和风格,不仅见证了当时法国政治气候的变化,也折射出战后萨特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立场的转变。

三、萨特的报章文体创作与文学风格的嬗变

1. 报刊媒体实践活动拓展了文学创作题材

几十年的杂志主编与新闻记者的身份,使得萨特有机会深入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局势和社会动态,全球化的视野拓展了他的文学创作领域,创作题材更具有国际性、当下性和敏感性的特征。

1945年,萨特访美时发现,美国存在严重的黑人歧视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影响到它是否会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在《战斗报》和《费加罗报》发表了大量的报道文章。回国后,他继续深化思考,最终完成了剧本《毕恭毕敬的妓女》的写作。

1946年,该剧在巴黎上演。这部作品的主题除了“表现的是被社会成见所摧毁的自由”(莫洛亚251)外,还反对种族主义,以致有人称萨特是反美分子。而他认为,也许作家在世界上干不出大事,但他有必要说出自己的见闻。

1955年,萨特的新剧《涅克拉索夫》在巴黎首演。该剧的产生与当时的国际政治局势密切相关。第一,反思了著名的维克多·克拉夫琴科(Victor A. Kravchenko)事件。1940年代末,苏联官员克拉夫琴科叛逃西方,并在美国出版了《我选择了自由》一书,披露了苏联的劳改营。一些法国报纸开始连载此书,引起轩然大波。苏联予以否认,法国亲共的《法兰西文学报》也称该书编造骗局,由此引起作者与报纸之间的诉讼,人称克拉夫琴科案。《现代》杂志为此刊登专文,表达了中立立场。第二,反思来自两大阵营的争论。从1947年巴黎电台的“现代论坛”节目播出之后,萨特始终反对在东西两大阵营里作选择。1955年,他接受媒体的采访时表示,当读者只能在狭隘的左翼媒体和被利益集团所操纵的庞大右翼媒体之间选择时,那就没有自由的媒体了。该剧讽刺了缺乏判断的大众对混淆视听的媒体盲目信从。第三,讽刺与抵制法国右翼分子反共宣传。1954年萨特访苏时,与同时访问的拉扎雷夫看法分歧,由此两人产生过节。萨特早已有意反击,虽然他一再声明该剧并“不是针对报界,而是针对某些报刊以及这些报刊所采用的反共伎俩”(《萨特文集》6:559),但实际上影射了拉扎雷夫及其右翼报业集团。萨特明言,这出戏醉翁之意不在于针砭个人,而是讽刺新闻体制。“我笔下的记者不是坏人,坏的是他们所服务的事业”(《萨特文集》6:562)。因为,所有的人都只能在一定阶段上起作用,最终起决定作用的还是制度、机构。

1956年,阿尔及利亚作家亨利·阿勒格(Henri Alege)写了《问题》一书,引发了萨特对战争及酷刑现象的思考。他在《快报》上连续发文评价此书,评论文章后来成为该书的序言。他不仅谴责了酷刑,而且深化了对施刑者和受害者关系的辩证思考,最终

完成了剧本《阿尔托纳的隐居者》的写作。1959年,该剧在巴黎上演。通过德国一个大企业家格拉赫家族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命运,所有的人都看到了深陷阿尔及利亚战争的法国,这是因为“当年我们同他们对峙的局面正好是今天阿尔及利亚人同我们对峙的局面”(萨特,《萨特文集》6:564)。在惊人相似的历史一幕里,萨特想说明的是,“每个人对那场浩劫的历史和战后的世界应抱什么态度?”(萨特,《萨特文集》6:导言19)该剧代表了战后欧洲知识分子对具有谎言性质的集体意志,即意识形态在人们日常生活中的作用的深刻批判。

可见,萨特后期的大多数戏剧题材都来源于当时的社会现实或政治事件,甚至是新闻热点事件。萨特采用即时的文学形式反映对这些事件的思考,因为“在剧中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对手讲话”(转引自柳鸣九514),戏剧被委以大用。他采取了电台节目的辩论形式,让剧中人直接展开思想交锋。由于话题的敏感性兼以萨特的加持,一经搬上舞台,剧作往往会引发巨大的社会反响。

2. 报刊媒体实践活动强化了新的文体意识

萨特认为,一个优秀的作家要善于运用、创造新的文体形式和风格,“不能固定于一种本质、一种形式、一种专业或一种文体”(转引自列维73)。他之所以能在文学中不断创新,是因为同时作为哲学家,意识到两种思维类型对语言表达方式有不同要求。

为了将文学与哲学和科学报告区分开来,萨特特别重视在不同需要下,恰当运用不同的文体。在他看来,“文体是表达一个想法或一种现实的文学手段”(《萨特文集》7:373)。文学文本不排斥简洁,它用简单句子表明直接含义。同时,它还包含着在深层相互配合的不同涵义。首先是用一句话说出三个或四个意思的方法,如果人们不能使语言表达多义性,那么大可不必去写作。然而,哲学文本的每句话都只应该有一个意思。它和科学报告一样是单义的,它的表达需要使用“一套技术语汇”(《萨特文集》7:377)。如果要提出新的概念,还要时时更新这套语汇。文学与科学报告的区别,就在于它的多义性,

“比方说我在《文字生涯》这本书里力求让每句话都带有多种相互重叠的意思”(萨特,《萨特文集》7:375)。作家要在文体上下功夫,除了“捶字炼句,毋宁用于始终在脑子里设想整个场景,整章情节,乃至整本书”(萨特,《萨特文集》7:376)。在萨特看来,如果作家的脑海里没有这个整体,那么文章的句子不是不协调就是无所为而为。哲学和文学的差别就体现在此。前者依靠“技术语汇”的建立关上一扇门,后者完成“多义性文本”后开启另一扇门。

在萨特媒体实践文学的各个阶段,由于媒介的不同属性及其使用目的,其文学文本也表现出不同的特征。以下分析就将萨特在报纸、期刊上发表的报章文体,与早年的哲学小说对比,以期发现其文学风格嬗变过程。

萨特早年的“存在文学”,在语言上保留了许多古典主义的修辞习惯,“写的文章段落大多极为冗长”(施皮格伯格651)。这种节奏呈现了一个哲学家对存在全面深沉的思考,显得滞重而缓慢,与现实生活不大合拍。自《恶心》发表以来,他的小说普遍使用这种节奏,以表现人物隐秘的内心世界。而实践文学则是要用文字唤醒人们去行动,这种节奏就必须改变。为了积极发挥一种介于调查记者和预言家之间的公共职能,刺激和促进这个世界的改变,他采取了新闻报道的笔法,将内省、沉思转变为行动。这种新的语言风格干练,笔法闪转腾挪,节奏转换迅速,不知停息。

弗朗西斯·让松(Francis Jeanson)指出,萨特每每描述比较关键的历史时刻,其文字总会表现出“明显的模棱两可”(132)。如巴黎解放时,他在《战斗报》上的一篇报道,描写了游行现场中人们的心理活动,具有早期存在文学表现隐秘内心节奏的一贯特点。长句多,节奏慢,让松称其是“正面”——“继承性”的特征。这段文字是对现实状况的客观描写,内心冥想恢复为日常表述,多为短句,节奏较快。这种直白简洁的语言属于“背面”——“变异”的特征。詹姆逊将“正面”的特点界定为“继承的形式”(inherited form),将“背面”的特征界定为“现代内容”(modern con-

tent)。让松所谓的“模棱两可”，是指萨特在文学转型过程中，两种句式交替使用而呈现出风格缠绕状态。詹姆斯则认为萨特在风格转型的过程中，其文本往往是“继承的形式”和“充满更为现代内容的风格”共存。“模棱两可”其实体现了萨特新旧交替过程中的“危机时刻”(a moment of crisis)(Jameson vii)，即作家写作发展史中的转折点和临界点。两人的看法可谓是横岭侧峰，各见其趣。

此后，由于萨特的介入更加“公开”，其文学描述也更加“客观”，这种具有“现代内容”的“变异”风格越来越突出。他直言不讳，“必须找到一种风格，其模式是日常口语，街上说的是活语言，以使报上各种人的直接表达与记者的文章之间没有断层”(让松275)。这种风格后来成为萨特媒体实践文学的主要特征，即杂糅了新闻报道的语言节奏、广播节目的同时性特征、电影蒙太奇的立体化手法，“这是杂色拼图的颂歌，是片段和碎屑的歌唱，是将万花筒提升到了世界观的高度”(列维81)。媒介融合后的各种技术倾向的句群交错杂糅，它们没有等级划分，而是和谐地混搭在一起。这种快速转换的节奏+混搭的风格，成为小说《痛心疾首》的主要特征。

3. 激进的新闻立场催生了语言暴力修辞

萨特文学风格的变化除了来自二战遭遇外，更多地是某种共同经历后的思想词汇和道德语言的继承。抵抗运动和战争记忆，使得很多年轻的作家包括萨特，开始以一种新的军事措辞来思考政治生活，它导致的思想风格就是：生命是由一系列与敌人的遭遇构成的。在文学文本中，他频频倚借准军事性的语言和正反合的辩证法思维，将所有与现实相关的事物以斗争的形式出现，从而展示“为和平而战”“决定性行动”的必要。

法国知识分子反思二战历史时，常用的关键词有——抵抗(resistance)、暴力(violence)、性(sexual)、背叛(treason)和通敌(collaboration)等，“它们被用以塑形和描述所有的战后事态，以及向个体提供的选择”(朱特，《未竟的往昔》64)。尽管萨特战前的小说也有关于“暴力”(《厄罗斯忒拉特》)与“性”(《恶心》与《一

个工厂主的童年》)的描写，但更多地是形而上学的思考，遣词立意上保持着与政治的距离。经过了战争，萨特所目睹的暴力无不与政治与权力相关，他意识到必须借助一个标志性的变化以实现自我超越。他再次被暴力等现象所吸引，并将其与“斗争”、“死亡”、“抵抗”与“革命”意识叠加起来，继而形成为后期文学文本中的“暴力”修辞。战前无休止的冗长而枯燥的陈述与斗争、变革和净化等社会现象相联系，沉闷的内心独自逐渐被替换为激进的政治语汇。借助文学语言上的渐变，萨特完成了媒体实践文学的自我超越——对革命的召唤。下面以他在《战斗报》上的报道予以分析。

在光复的日子里，萨特感受着胜利前血与火的洗礼。战斗中无辜的百姓被杀，一个“撬门”的“男人”被德国士兵从后面开了五枪打死，萨特浓墨重彩地加以报道，以唤起公众的良知。萨特关于战争“暴力”的所有体验，浓缩成“来复枪”、“射击”、“金发碧眼”的德国士兵和“死亡”等核心意象。它们像是烙铁打下的鲜红印记，又出现在《痛心疾首》中：

他[马蒂厄]走近栏杆，直挺挺站着射击。“这是一次极大的报复，每发子弹都是对他过去不敢有所作为的报复。‘一枪射向洛拉，因为我不敢偷她的钱；一枪射向玛赛儿，因为我早该甩掉她；一枪射向奥黛特，因为我不敢吻她。这一枪射向我不敢写的书，还有一枪射向我所拒绝的旅行，再有一枪射向全体我原本憎恶却又竭力去理解的人们。’他还在射击，法律被打得漫天飞舞；你说爱你邻人如同爱你自己，‘砰’一枪打烂你的臭嘴；你说你永不杀生，‘砰’一枪正中伪君子的嘴脸。他向大写的人开火，向德行开火，向世界开火：自由就是恐怖；火在村公所燃烧，火在他头脑里燃烧；子弹在呼啸，自由得如同空气，世界连同我一起爆炸。”(萨特，《萨特文集》4:241—242)

小说中的这段描写，与他在《战斗报》的速写相比，具有很多相似的信息元素。围绕着“射击”这个共同的核心动作，都有对枪的细节描写和德国士兵的形象摹画。同时，大量使用短句，节奏转换迅捷，明显具有报章文体的特点。多年以后，在浏览《人民

事业报》上系列报道的标题时,人们还是能够轻易察觉这一暴力情绪依然在延续。1970年5月,萨特在为《人民事业报》的两位主编拉丹特(Le Dantec)和勒布斯(Le Bris)的辩护中,试图证明新闻报道的暴力本质是正当的,这种表述是愤怒和受剥削工人的自然表达。此情此景,读者会想起法国大革命时期在报纸《人民之友》中的马拉,他也这样以反复的疯狂独白向读者们呼喊:“阻止叛徒们!”“到他们的住所去追查他们的叛变迹象!”“揭穿他们!痛斥他们!砍他们的头!”(让纳内66—67)。

对于这种激进的文学风格,巴尔特曾有过描述。法国大革命时期一位叫埃贝尔的积极分子,曾担任一份报纸的编辑工作。他在编写每一期《杜歇老爹》的时候总要用一些粗俗字眼——“见鬼!”或“妈的!”。这类词汇其实并不意指着(signifiaient)什么,但却指示着(signalaient)什么。为什么又这样呢?这是当时整个革命情势的需要,这样一种文字的作用不再只是去传达或表达,而是将一种语言外之物强加于读者,这种语言外之物既是历史又是人们在历史中所起的作用(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3)。同样,1968年法国“五月风暴”以后,由于阶级斗争需要将力量日益强大而语言依然粗俗的工人阶级唤醒,媒体实践文学反对“存在文学”温文尔雅的贵族旨趣,也不再描写资产阶级“正确的”的社会行为举止和共同的文化标准,而是采取了“极端主义的措词方式,嗜好恐怖和语言暴力,倾向于用简单相斥的范畴来划分世界”(朱特,《未竟的往昔》71)。萨特同埃贝尔一样使用粗俗词语,传达的也是一种神话意义:粗俗可作为一种革命符号。就像埃贝尔的目的不在于冒犯人们的社交惯例,而是为了刺激他们,打破他们的假正经,最终表达对现有社会秩序的不满一样,萨特文学中暴力修辞也是表现学生对警方暴力挑衅的反暴力行为,其目的不是追求混乱无序,而是渴望一种新的不同秩序。

质言之,这种暴力修辞的语言结构将世界简化为非此即彼的对立模式,“一切都可以用摩尼二元论的方式来划分:共产主义/资本主义,苏联/美国,正

确/错误,善/恶,他们/我们。排中律(Tertium non datur)。这次又是萨特给了它一个最一刀切的解释”(朱特,《未竟的往昔》71)。关键并不在于解释世界而是去改变世界;对于他的这种判断,萨特并不需要知道他者是如何感受的,而只需要让他者知道他的立场就行了。他日益激进的媒体姿态,似乎想向世人表明,“人类境遇的某些部分事实上是可以通过暴力,在殖民主义或者无产阶级的受害者的支持下得到克服和解决的”(朱特,《未竟的往昔》106)。他希望通过这种极端实用主义的语言观,获取最为直接的效果——听到他的声音,工人阶级可能真的会立即抓起枪来,走向街头。

四、一个试图完成的结论

从积极方面来说,萨特的“媒体实践文学”特色鲜明,即采取《现代》期刊式的写作风格。它们的共同特征是,语言在其中不占主导地位,社会责任成为其主要价值标签。它是萨特的政治立场和语义完成了双重转变之后,在一个重新整合的思想环境里进行的社会实践。他希望通过语言的魔力,以及由此而生的行动使现实屈服。为达到这一目的,萨特在文学的跨界化写作方面,做出了超越其他法国作家的全面尝试。《现代》杂志提倡“利用所有的文学类型来让读者熟悉我们的观念”(Sartre, Situations 28),萨特也成为各种文体类型的操练者。他坚持文学非本质主义的立场,不是从本体论出发研究文学是什么,而是从实用论的角度来思考文学可以干什么。为实现社会介入功能,文学同各种媒介相结合,并衍生出交叉、边缘的文学样式,最后综合成为“媒体实践文学”的总体形态。虽然萨特“媒体实践文学”的水平参差不齐,但就其实际影响来看,确实发挥出了介入社会、改变世界的作用。

然而,正是由于过于切近的实用主义,“媒体实践文学”还是具有难以克服的问题。首先,从纯文学的角度来看,萨特最为接近“媒体实践文学”的作品是三部曲小说《自由之路》的后两部《缓期执行》和《痛心疾首》。自此以后,就鲜有介入特点鲜明的小说作品。《什么是文学?》所列举的一些作家,往往同

时在自传、报告文学、政治史、社会学和心理学的领域里创作,文学的界限变得非常模糊,以至于难以确定这些作品的类型。雷蒙·阿隆认为,萨特这些交叉的、边界模糊的文学样式不属于“正规的”文学作品(267)。巴尔特进一步指出,这种思想式(或政治化)写作形成了一种“类文学”(paralitterature)(《写作的零度》19)。它自我封闭语言,夸示立场。“在这种情况下,写作变得像是一份集体声明书下角的签字(这份声明并非他自己撰写的)”(《写作的零度》18),尽管它仍具有文学的特征,但这种思想式的写作是不稳定的。

其次,“媒体实践文学”的介入效果往往差强人意。萨特曾说过自己年轻时的理想是——同时成为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一方面,他试图通过形而上的思辨获得精准的真理;另一方面,他想让自己相信的哲学和真理在小说中得到表达。表面看来,萨特似乎实现了这一理想。实际上,如何在文学中既保持哲学般抽象的公正、真理和理性,又能实现介入社会的现实目的,萨特左支右绌、难以两全。

萨特的“介入”道德观充满矛盾张力,遭致许多质疑,一是作家通过文学选择道德实践的理由,另一则是文学完成道德实践的能力。巴尔特认为,文学必须“介入”社会的理由缺乏伦理学上的正当性,而且介入的方法多属无效,勉力为之的结果往往事与愿违。事实上,萨特后来激进的政治介入观常常导致明显的失察误判。柳鸣九指出,由于萨特非常社会化和政治化,热衷于卷入各种路线的文化争端与政治斗争,投入得过于执著,既没有给自己留下缓冲的距离,也没有保持一个思想家的高瞻远瞩和超然态度(柳鸣九、钱林森 77),一些急进的介入之举常常留有遗憾。

最后,从“媒体实践文学”的价值来看,这类作品貌似庞杂,但是少有审美意义上的精品。相比于其追求而言,“萨特自己的贡献则显得异常保守。公平地说,他有限的文学作品与他的热情并不相称”(Davies 25)。雷蒙·阿隆最早指出萨特文学介入承诺的空洞自负,在他看来,知识分子“介入”的本质其实是

一种意识形态和道德之间的矛盾。在他看来,除了加强气势外,萨特实践文学的大众传播策略对受众的审美习惯不构成任何挑战。毫不探索改变“一切”和无所作为之间的广阔空间,使得他由激进的浪漫主义鬼使神差地变成了保守派,它本质上是传统的(朱特,《责任的重负》267)。巴尔特则认为。作家与作家有两种明显的区别,第一,作家总是向社会提出社会不总是向其要求的东西,其写作总是具有一种自由的但同时也有些“强调的”风格,以致形成作家言语批评的、急迫的特征。第二,在文学言语的社会功能方面,既然作家专注于言语,他就不能去精心加工一种叫喊声,他不允许自己来用两种言语方式。不同的是,作家那种“‘挑衅性的’言语毫无困难地接受了文学机制的控制,并很快地和完美地被同化了”(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179)。因为其中包含的挑衅性思想,在一种非人为领域(no man's land)的形式中被削弱,所以其写作从来就没有完全的标新立异。

尽管萨特在思想上固守高地,但他后来降低姿态,放下身价,采取受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碎片化、跨界化、浅白地传播给大众。在生产与传播思想过程中,他把所有复杂的事务交给自己来打理,成为行走于书斋与媒体之间的“思想运营商”。同时不断高声地吆喝呐喊,只是为了吸引更多民众的注意。媒体实践文学的快速即时、报章文体的化繁为简、介入目的的简单直接,都是为了给公众提供一个简便迅捷的思想服务。只要能够做到低门槛、全覆盖和高驱动地教化大众,即使斯宾诺莎和司汤达不能兼美,即使自己由“先知”纤尊为“作家”,他也毫不在意。

参考文献:

- [1]雷蒙·阿隆:《雷蒙·阿隆回忆录》,新星出版社,2006年。
- [Aron, Raymond. *Mémoires: 50 ans de réflexion politique*. New Star Press, 2006.]
- [2]罗兰·巴尔特:《文艺批评文集》,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Barthes, Roland. *Collection of Literary and Artistic Criticism*. China Renmin UP, 2008.]
- :《写作的零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

- [...]Zero Degree of the Writing. China Renmin UP, 2008.]
- [3]Davies, Howard. Sartre and Les Temps Moderns. Cambridge UP, 1987.
- [4]Jameson, Fredric. Sartre: The Origins of a Style. Columbia UP, 1984.
- [5]让-诺埃尔·让纳内:《西方媒介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
- [6] [Jeanneney, Jean- Noël. The History of the Western Media. Guangxi Normal UP, 1996.]
- [7]弗朗西斯·让松:《存在与自由——让-保罗·萨特传》,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 [Jeanson, Francis. Existence and Freedom: Jean- Paul Sartre's Biography. Beijing UP, 1997.]
- [8]托尼·朱特:《责任的重负——布鲁姆、加缪、阿隆和法国的20世纪》,中信出版社,2014年.
- [Judt, Tony. The Burden of Responsibility: Blum, Camus, Aron, and the French Twentieth Century. China CITIC Press, 2016.]
- :《未竟的往昔》,中信出版社,2016年.
- [---Past Imperfect: French Intellectuals, 1944-1956. China CITIC Press, 2016.]
- [9]贝尔纳·亨利·列维:《萨特的世纪——哲学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 [Lévy, Bernard- Henri. Sartre's Philosophy of the Century The Commercial Press, 2005.]
- [10]柳鸣九编选:《萨特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 [Liu Mingjiu, editor. Studies on Sartre. China Social Sciences Press, 1981.]
- [11]柳鸣九、钱林森:《萨特在中国的精神之旅——柳鸣九、钱林森教授对话》,《文艺研究》第27卷第11期,2005年11月,第69—80页.
- [Liu Mingjiu and Qian Linsen. "Sartre's Spiritual Journey in China—Professor Liu Mingjiu and Qian Linsen's dialogue." Literature & Art Studies, vol. 27, no. 11, Nov. 2005, pp. 69-80.]
- [12]莫洛亚:《从普鲁斯特到萨特》,漓江出版社,1987年.
- [Maurois, André. From Proust to Sartre. Lijiang Press, 1987.]
- [13]让·皮埃尔·里乌、让·弗朗索瓦·西里内利主编:《法国文化史(卷四):大众时代:二十世纪》,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 [Rioux, Jean- Pierre and Jean- Francois Sirinelli, editors. The History of French Culture- Era of the Masses: the 20th Century, Vol. 4, East China Normal UP, 2012.]
- [14]萨特:《萨特文集》(1—7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 [Sartre, Jean- Paul. The Sartre's Collection(Volume 1- 7).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2000.]
- .Situations II, Présentation Des Temps Modernes. Gallimard, 1975.
- [15]Scriven, Michael. Sartre and the Media. St. Martin's Press, 1993.
- [16]赫伯特·施皮格伯格:《现象学运动》,商务印书馆,1995年.
- [Spiegelberg, Herbert. The Phenomenological Movement: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he Commercial Press, 1995.]

Sartre's Practices in News Media and Journals and His Changing Literary Style

Yan Wei

Abstract: After 1945, Sartre was highly involved in the media in order to practice the idea of "literature of praxis" and thereby form his "media literature of praxis." His practices in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greatly influenced his literary writings. An analysis based on a comparative reading of Sartre's journalistic and literary texts during this time period may reveal that Sartre's practices in the press expanded the range of subjects for his literary writing, strengthened his new stylistic consciousness, and his radical journalistic standpoints precipitated the violent rhetoric in his language, which ultimately triggered a constant change in his literary style. Sartre's "media literature of praxis" is flawed both in theory and practice, but in terms of its actual effect it did accomplish its initial intent to engage in the society and change the world.

Key words: media literature of praxis; literary style; "front" features; "back" features